

2/108

古蘭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91

古蘭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目 录

古蔺县官立高等学堂的演变	赵佩君 (1)
古蔺解放后的第一所师培中心 ——教师进修校	曾继湘 (18)
五十年代的第一张党报 ——《古蔺报》	张世鲸 黄明高 (30)
火星山下发现的恐龙骨	肖元舫 (37)
解放前古蔺青山生意概述	罗儒昭 (39)
太平渡朱荣发中药材商号的经营发展概况	朱明安 (43)
太平渡“斗纪捐”征收始末	张世鲲 (47)
古蔺酱园酿造业发展梗概	周显亲 黄渊洪 (50)
胡泽美撰《郎三酉先生传》	杨应儒 (58)
国民党古蔺县党部的组织与活动概况	许廷碧 (61)
蔺州辨析兼论彝扯勒部活动中心	罗希儒 (76)

古蔺县官立高等学堂的演变

赵佩君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古蔺建县，原系由永宁县迁到古蔺，马世珍随任到古蔺任知事（当时称正堂）。随县迁来的教育行政机关叫劝学所（职称视学），设在文昌宫（即现在的计生委），第一任视学是邓星桥。永宁官立高等学堂同时迁来古蔺，暂设在关帝庙（现财税局）。马世珍将营房头地址新建学堂（即现在一小厨房部份），第二年迁入新建学堂内。全学堂基地约二百多平万米，坐北向南横长三大开间（平房），中间是礼堂（十年前未改建时，还可看见礼堂大梁上书有“大启宏图”四个大字，两头分别书光绪三十四年 月 日和正堂马世珍建等字样）。礼堂左右为教室，两侧出二开间是楼房，楼上为学生寝室，楼下除两间教室外，其余为教师寝室、办公室、教学准备室、仪器室，还有工友宿舍和开水房。右环房后面即为厨房、饭堂。操场后面是厕所。礼堂前院两侧有花台、并搭有葡萄架。春夏间满架藤叶，绿荫深浓。中间是甬道，院坝坎下约有五十平方米的校园，种树栽花，甬道两旁除两株饭甑粗的大柳树外，一排排洋槐树。春初槐花香满校园，绿荫凉爽，令人陶醉。学堂四周除左面是庙地或民房外，其余右面和前后均筑有土墙围住。

高等学堂迁来古蔺，就成为古蔺县最高学府（前旧制经纬

学堂停办)。虽废除了过去旧的个别教授法，实施新学制班级授课，但教学内容还是沿袭经史典籍为主，增设算术课，教师是原来的耆学宿儒，仍以孔孟之道，培养学生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修身立品性”。

1909年（宣统元年）起，开始称小学。学制九年（高级四年，初级五年），把学堂改为学校，全称为“古蔺官立高等学校”。傅震轩任校长，下设学监（又叫舍监，当时学监是专管学生宿舍的）。课程：初级班的有经书、国文、修身、算术、图画、音乐、体操、手工等；高级班的增设格物、博物、地理、历史。以后逐渐增加自然、社会、农业、商业、英语等。教育方法，完全以课堂教授为主，结合课外体育爬山活动。实行实业教育。虽是废除体罚，不强调死记硬背，但当时任教的老师，大多是来自旧学制学堂，仍然强调死记硬背和体罚。如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尚能回忆背诵当时的课文：“①我国之国民也，自古以来，居于世，食于世，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不爱我国耶？”②发辫为满洲人之制度，我国古时无有也，世界各国也无有也。民国成立之初，遂下令剪发辫，便于做事，有百利而无一弊也，又合于卫生。凡我国民勿顾惜守陋也”。

民国以后，川滇黔军阀割据争地盘，政权不一，教育方针朝令夕改，无所适从。1922年（民国十一年）改官立高等学校为县立高等小学校。高等小学学制为三年，（初级为四年）入学学生年龄为11—13岁，其时实际入学学生年龄，大部份在16—17岁。（在1927年我在此校读书时，东区来校的学生有20岁以上的。）

课程改革，废除了经史典籍，教材用共和国教本，名为共

和国教科书。国文课有《张骞通西域》、《班超投笔从戎》、《祖狄闻鸡起舞》、《正气歌》等，历史有《林则徐抗英焚烧鸦片》。着重手工、图画、兵式体操初学日式操。至于教学方法没有多大改进。袁世凯称帝的一段时间，教育宗旨又经一番波动。袁死后，教育部门重新提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随着西欧文化的输入，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影响，民主、科学之风渐兴，我县城乡逐渐兴办学校，女子小学也有高级班。1923年（民国十二年）县成立了教育会，改劝学所为教育局，原视学称局长，以下设督学，分东、西、南、北四区。古蔺县立高等小学校在东城区督学肖若愚的指导下进行教学，肖督学一直任到1949年。

从1922年公布新学制后，县立高等小学又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高级小学三年，初级小学四年。民国十七、八年，高级改为两年，初级四年。此制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学校课程，小学取消修身课，增加公民科、卫生科、自然科，高年级手工科改为手工艺术科，图画改形象艺术科，体操改为体育，国文改为国语。课时改为分钟计。教师有师范学校毕业来的，教学方法开始采用启发式和直观教学了。改以前的学监为训育主任，废除体罚或变相体罚，如罚跪、罚站、关禁闭等。课务方面设教务主任，专门负责课程分配及寒、暑假学生的成绩考试登记通知事宜。训育主任则主管学生的品德、纪律及处理纠纷事项等。韦汝仁当校长，曾经同南城小学校长戴玉阶联合组织一个音乐队，应召赴泸州参观二十军军长杨森主办的川南体育运动会，当时古蔺还没有体育设施，只有去参观，殊知大会竟奖励给学校的铜鼓、苏钵、军乐器，以及奖给每个学生一套卡其布的童子军上下装，并配有旗帜、帽徽、哨

带、童子军棍等。还有童子军体操教材，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童子军又进行军训加强战备教育。

1927年（民国十六年），许道骅任校长，原来学校就有固定校产田租七十多老担（每担约400市斤），会计孔敬卿经管和搞事务工作。学校的教职员工薪资、办公费、伙食费（教师集体开伙食）、培修费、临时开支等费均在校产收入支付。当时教师每月薪资毫洋18元，校长20元，职工略低，校工友（那时叫杂役）不到10元。所聘的教师大多是城里住家薪资不高，物价低，但都不是全靠薪资收入，只有少数教师全靠此维持生活。虽薪资低微但教师们均负责认真教学，教师有成正斋、肖鸿开（叙莲溪人）、邓希尧、邓希颜、肖仲猷、成龙文均是教国语、算术、史、地课程的。王蔼生教英语，彭友仁教农业，梁荫蓝教音体。罗孝伯任训育，这些教师大多是旧制中学毕业师范毕业、还有大学修业的。国语课除课本外还选适合于时代性内容的古典文教授。每周的作文在该周内作、并批改发下；算术副本作业下课后即收改发给学生。史、地均有副本也有笔记；照黑板画图绘画；英语从单词教到造句、英、汉翻译、填空、八品词教法；音乐从简谱教到正谱音符、认识五线谱，在五线谱上学生能识正谱唱歌，考试时能正谱翻简谱，互相翻填。梁老师教体育打破女生与男生们打兰球的界限，师生互相尊敬。梁老师在女校任教时，打破了女子长期禁锢在深闺的黑暗统治。首先就是剪掉背在背上的长发辫子，穿短衣短裙大胆在街上走，破除封建风俗。这些破天荒的开辟行动，也遭到了地方封建势力的打击，经受一次风险。这年女校开了一次恳亲会，邀约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男学生组织队伍参加，还作了木棒哑铃（梁老师教的）团体表演。从此破除了男女校一直闭塞

的旧习”进而互相往来。

1928年9月，高级小学校曾开了一次菊花展览会，礼堂外院坝、花台上和周围分行种植菊花，花园内在走道两侧分各种图形、行列种菊花，开放时，绚丽多彩、姹紫嫣红，白色碗大的玉狮子，龙须披撒的十丈珠帘，白色如玉盘的银盒积雪等约二百多品种，繁花似锦遍布校内上下花园，令人陶醉。这是古蔺县城从未有过的花展，惹动各界人士参观，惊谈不已。

在许道驊任期内，曾将校产积余资金增建了两幢房子。一幢在前面校园门口有走廊的三间长房，中间楼上为图书室，下为校门，左右两侧为教室（一、二年级）。后面的一幢平房无楼，在礼堂后有报厅一间，中为往后操场过道，左右为教室。增加招收一、二、三、四年级四班学生，和前高级两班共六班，并增聘教师若干人，全校学生一律着白色制服，校规严格。

1928年，黔军放任古蔺的县长高兆奎是一个老知识界人士（文庙改建就是高任内）通令各区乡高年级毕业学生必须到城参加统一会考，考试规程严密，统一在一处闭门考试三天。考试课程科目分国文、算术、史、地、自然、英语。考试揭晓，录取学生张榜在关帝庙墙上。榜上有名者由县发毕业证书。县立第一高小校占优势，英语一科就比其他学校好，前几名都是高小校学生。高县长规定，每月举行一次月课，公开命题，不分等级界限，男、女、老、幼各界人均可按题作文，到指定时间、地点缴卷，如获选者列榜公布，并发给奖品。

1929年，民国政府又颁布了以“三民主义”为新的教育宗旨，推行党化教育。增设三民主义党义科目，改工用艺术为工作科（后改为劳作科），改形象艺术为美术科（后改为图画科），规定各校教材使用。根据三民主义教育（党化教育）的

实施原则适合党义、国情时代性而编定新的时代教科书。制定《训育纲要》、《公民训练目标“四条”》、《训练德目“十八项”》、《训育标准》、《青年守则》、《精神总动员六个纲要》。通令各校执行“四维”、“八德”，“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通令学校制兰底白字横匾悬挂在礼堂上壁正中，但师生们在思想上只听到了就算了事，而进步者，仍以反帝、反封建、反专制政权的思想进行教学，教者本着教学目的教育学生，学生也只在教师教育下努力学习。

1931年，王月潭任校长时，因聘隆昌人宋△△任训育，其品德言行不端，引起学生不满，全校罢课请求解除宋某的教职，闹了一场风波，因临寒假，以放寒假息事，以后宋未任教职，次年开学有几个学生因此次闹事罢课而被默退。

1932年，邓成均（邓均磊老师）任校长时曾聘任正阳为训育主任，时值日寇燃起“一二·八”松沪战争，县城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为首掀起了抗敌救国宣传运动高潮，校长、训育主任和教师叶菲禄等均是进步人士，他们团结学校其他教师们对旧政府搞军阀割据，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而对日寇侵华暴行却置若罔闻，因而激起了无比的愤恨。教师和学生全体动员大搞宣传日寇侵略的暴行，引起了全体人民为报仇雪恨而踊跃捐款，献金支援前线，对日货展开了抵制购买运动。我县彰德乡人骆健郎在十九路军任连长，于松沪战役中为国捐躯。当年县政府为悼念骆烈士在城隍庙内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以后国民政府还在彰德乡穿山洞路侧立了一块大石碑，张瑞舟老先生写“母子同仇”四字。下录蒋中正题。

1934年，张孟昭任校长，学校校产全由教育局统收开支，

学校一切开支由教育局拨发，每期教职员工薪资、办公费，设备、培修等费用，要开校后由学校造表签呈上报教育局审查才能拨发。取消原学校会计人员，一切款项由校长领取支付。张因校产统收懒于理事，学校只是按旧制施教，勉强维持。

以后是熊崇修任校长两年（1935——1936）。

1937年（民廿六年），赵白宇、曾传芳、甘立身、何衍、刘泽远由川南师范校毕业回县，县政府派赵任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其他聘任大多是旧制中学毕业、中等专业的教师任课。学校从此又大振兴起来。师生全体住校宿食，师生服装规定教师着中山服，学生着妥布学生服，一律整齐划一。教师多是青壮年，无家庭事务羁绊，以校为家，学校从上到下，制定教与学工作的多种规章制度共同遵守。校风严肃，团结，活泼、整洁，文明礼貌。师生相互敬爱，路途相逢学生侧立敬礼，老师答礼。除校长、教务、训育外，各班都有级任导师，每周轮换值周导师，负责每天几次集合整队，管理纠纷事务。训育主任负责填写轮换值周导师名牌和周训牌，周训牌选录名人名言。值周导师在每星期一早餐后到校上课前学生列队集合十五分钟内训话。重视毛笔习字，周训后半点钟即学生毛笔习字学课，字本写字，按年级分填红、模格、临帖。习字本由值星生收缴各级任导师审阅批改。各年级教师认真备课、教课。学生早晚到校自习。早晨六至八点钟，晚间七至九点钟，值周导师管理自习和放学。

学校开过一次恳亲会，展览学生各科成绩，在各班级教室展出，请学生家长参观，学校与家庭教育互相配合管教，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品德健康成长。

1937年，正逢“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学校参加宣传抗教救亡工作。教唱抗战歌曲，写大字标语，画抗战宣

传漫画，尽量在教学的时间外搞宣传工作。适逢省督学江东之来我县视察教育工作，亲到县立第一小学校视察，视察后了解了此校自开校起振兴和改进的过程和学校面貌，有实干精神，校长教师以身作则，表里一致，学生成绩上升，家长好评。

江督学曾在当年的新蜀报上刊登《有声有色的古蔺县立高等小学校》文章。

赵在任期内扩展了教室，打通了齐安宫后砖墙开门到庙内（此庙是无住持管理的空庙）将正殿天井前左右大厅辟为五、六年级教室，以后早晚放学进出大门改走此庙正门。经时不久，又有驻军占据，出入仍由原校门出入。

1938年，赵卸任后由杨贞伯、袁廷相相继接任校长，日寇疯狂侵占我国内地，学校对抗战宣传工作仍努力进行，加强学生爱国思想教育，也随时组织学生队对外宣传，曾带学生徒步到川滇公路演唱，慰问筑路工人，鼓励工人们加速完成全国惟一通向滇、越公路的任务。这时我也在该校任教并参加活动。

1940年（民国29年），国民党实行《新县制》推行管、教、养、卫四位一体的政教合一体制。古蔺县第一高级小学校又改为“中城镇中心学校”，镇长兼校长，校长兼副镇长，而中城镇镇长不管学校，学校校长也不过问镇的政务。学校主要负责人仍是原委的校长负责。中城镇中心学校校名直到新中国建国后又有改变，现为“古蔺县古蔺镇第一小学校”。

1939年，此校曾参加了一次全县召开的兰球比赛运动会，各区乡小学都参加，比赛结果，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获冠军。

1941年赵佩君任校长，聘请邱逸生为教务主任，刘君度为训育主任，邓尚儒、何显忠、孙光禄（进步人士）及其他

男、女青年教师十多人,开展古蔺的田径体育项目,教课的许国模,是成都艺专校音体系毕业,他是古蔺的田径项目体育教练首创者。本年参加肖端重县长召开的全县中、小学体育运动会,如标枪、铁饼、铅球、跳高、跳远田赛类,球类,径赛类的赛跑,均是许国模老师教练的。因此在这次参加的全县小学体育运动会项目中获得的第一名占多数。能得到这样多的荣誉也是全校男、女老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教课方面很认真,刘君度训育主任重视礼貌、品德的管理,校规严肃。邱逸生教务主任工作认真踏实,他一直是不声不响地实干工作,对期始、期终教务工作搞得很完善。平时少与人接近,可是在他发言中可听出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信任尊重。教师们都能忠于职责,尽到努力完成教学任务。学校除授课时间外,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音乐教抗战歌曲,并在城内和郊区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有钱出钱,到抗日战争前线去抗敌”。画巨幅《收回国土》的漫画。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黄花曲》等节目。

1942年何树仁担任校长一年。

1943年——1945年,赵佩君又任中城镇中心学校校长,聘任教师有余辉、邓尚儒、黄太德、许济昭、曹止静、成其圣、曹思璜、王良清、王永华、许文昭、王良英等,前面几人都是地下党员。此时日寇侵华已临近贵州境内,部分流亡的难民,已逃流到了古蔺县内,他们遭受的家破人亡的惨状,闻者心痛,见者泪流。于是我们加强了学生抗日救亡的教育。在教课中语文不一定按颁定课文教授,选古往今来抗敌舍身救国的英雄、烈士事迹的教材进行教学。地理科,利用地球仪和板画中国地图指出我国已有哪些省、市、县地区被日寇占领,唤起学生救

亡图存。自然科教现代化战争武器，化学武器和防御知识，体育科加强军事体育教练，体力锻炼，和传授军事知识。一切教学工作都重在抗日救亡的教学上。

1943年，学校开了一次恳亲会，全校师生全体动员整理环境，和内容布置，把学生各科成绩作业分年级分类在各级教室或挂、或陈设展出，恭请家长们来参观，开茶话会报告学校教学经过，会后游艺表演，家长们很满意。

1943——1944两年中各班级(当时共有六个年级十二个班)每班分上下两级，人数增加到将近七百人。在学生骤增的情况泄下，桌凳就不够用，经对外争取获得两次支援，曾庶藩捐凳子壹佰个，张九如捐款200元做桌凳数十套。在这两年中下期全校各班级组织学校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兰球、乒乓、跳高、跳远、铁饼、铅球、50米赛跑等由各班级选选手参加，教师聘为裁判员，奖品由教师们自动捐资，优胜者有团体、个人奖。文科也举行了国语，算术班级个人竞赛，成绩优良者也发给文具书本奖励。

1943——1944年的抗敌宣传工作，因学校的进步青年教师和多数的青年教师对抗日情绪很高，痛恨旧政府和握兵权的军阀们只打内战不抵抗日寇侵略，眼看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已逐渐临到我们头上。因此师生们除教学工作时间外日夜不息，不顾疲劳，满腔热情，宣传沦陷区同胞们的流亡惨状，大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歌剧、话剧如《黄花曲》、《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写标语、画漫画，用各种形式宣传。余辉老师写抨击国民党军阀不抗战的文章，自编《千人歌》、《胜利属于我们》英翻汉音(维特威)歌词，表情演唱。在学校板报上写“民主刊”红字刊头。早晨六时带学生队伍在街

上晨呼，喊口号：“同胞们不要酣睡了，投身到抗敌前线去！”这些救亡工作不分时间进行，随时都在活动。学校进步青年教师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饭余茶话后都在漫骂。

有一次余辉老师在五一级教室楼上教语文课，他选新华社社论教课，适逢教育科长李伯岳路过校门外巷道（此楼挨校门口楼上），听到内容，回县喊传事传呼我到教育局询问，“你校门楼上是个老师教课？为何选新华社社论教课，不按课本讲课，是不是共党份子？”我暗地吃惊，平时也知道老师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日常发不满言语。我答复说：局长，我聘的教师没有共党，教课选课外文章对学生增加时事认识，鼓励学生的爱国思想，讲解时局词语是激动的，以后少教这些就是了。我回校给余老师和一些老师们谈，言语多加注意，以免少发生麻烦。

在抗战期中国国民党政府已几次内迁，敌战区的学校均已停办，能迁到川、黔、滇的大专学校也是流动中教学，各大中城市均被轰炸烧毁，工、商业及各种企业全部瓦解，教育事业基本无主办机关照管，百物奇缺，在没有沦陷的学校，教科书由省教育单位编发，纸张颜色灰暗，装订，样式粗糙很坏，内容也简单，对学生教育没有起到提高的作用，都是在战争紧张压力下的应付形式。

教师生活、薪资也受了很大的影响，因法币日渐贬值，物价波涨，教师薪资数额照1937年时的开支每月18元毫洋，校长20元，以后改变毫洋为法币仍以元为单位。纸币逐渐贬值，物价上涨，则使教师连伙食都受了影响。因此发动学生以尊师名义呈报教育局批准每个学生每期缴尊师米二市升（贫苦学生不收），以补教师伙食。在旧法币纸币改为银元卷、金元卷，以后

一元单位提高到万元单位，但也降低不下物价，甚至不管什么卷都不顶用，形成以物易物。市面上全是以物换物，学校教师薪资均发给大米，每人每月二斗（约八十市斤），拨发成黄谷条子，各机关职工均发拨黄谷条子，拨得谷条如在较近仓库发给的，也要自己去背运或请劳动者去运，要付给运费。学校教师那有时间去运，请劳动者去运也要付运费，在所领的数内扣付，每人二斗米又剩多少。更有可恨者，拨黄谷也有弊端，有人事关系的就拨得近点，否则东拨西，南拨北，远隔百里。每月工作仅这点微薄收入，给拨粮单位折腾，竟有一些人与拨粮单位拉扯合谋收买拨条，七、八折收买，教师拨得的黄谷条也只好如此低价处理，收购拨条者集中收购由他们去转拨地区作弊谋利。教师们遭受拨条的经济损失是可怜的。因此视当时的米津拨条为“飞条”，学校教师如此的薪资待遇延至1949年解放。

中城镇中心学校1943——1945年，教师的教学工作是很突出的。对学生受益很深的要算成其圣老师，他是训育主任兼任五六年级的算术课，他的教法很灵活，每次讲课总要使每个学生都能全部懂得，有个别不了解的，又在课外单独或集中讲解，学生们的作业本总是当堂批改，时间不够也在下课休息时间改阅发给，每本都必须亲自校阅。因此这两班学生的算术成绩突出上升，学生们现在都在工作，互相会晤，还念念不忘成老师的淳淳教诲。

1946年，袁虞若接任校长。袁任内聘教师有陈光翔、余辉、许济杨等。当时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公教人员所得薪资无法维持生活，学校教师吃饭已成问题，引起了全城各小学教师罢课。各校老师率学生队伍在街上游行，喊口号：“学生要读

书”，“老师要吃饭”、“贪官们肥了”，哄动了全县，影响很大。这次罢课是建校后的第二次。

余辉老师和进步教师们在学校以“雪山关”刊物名称出刊，主要内容是反映贫苦人民在乡、镇、保甲人员和地霸、土豪们的压迫下，余辉以“瘦牛”的笔名写文章抨击他们，题为《为全县小学教师们呼吁》。

1946——1947年是李天璋任校长。

1949年，赵佩君又第三次任此校校长。聘的教师大多数是青年教师。朱宗祺任训育，黄太德任教务，教师有许济昭、许济淮、许国粹、朱钰、代维鲲、项冤玉、付忠林、赵霖、王良瑛、张雪琴等。这期课程仍是原来那一套，内容也没有改变，纸张印刷很坏，有些课本字迹很模糊，这种情况是原国民政府军、政及一切组织机构已日渐秃丧，全国大部份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军、政维持他们的政权已经不行了。

这年的九月，张树良率领武装队伍数十人到古蔺任县长，张来声势浩大，大张旗鼓宣扬他来古蔺清查共产党，气势汹汹要抓捕地下党，警戒森严。当时中城中心学校已开学月余，教师任聘已满，而县府突然派出一青年科员叫王国良（古宋人）到校任教，在聘教师名额已满，多加一名薪资又怎样报领，只好婉言推卸，但张硬性指示不任全职也要兼课。在张的压力下只内安排在初二年级任算术课（这时孙光禄和代崇光已被关在县府土碉内），王到校虽一度与教师们介绍，但入地生疏，教师们少与他接近，每天上课各执行教课任务，课余时间很少，大家都不理睬他。

有一天，张派人来学校传呼我谈话，我去县里，张即喊我到他的内办公室（即现在的县志办公室），他开口就问：“你学

校有无共产分子？”声色俱厉。我是早知张来县任务，内心虽然吃惊，但仍镇静答复：“我聘的老师大多是我的亲友和过去我的学生。”张喊我书面具结担保，我即具结担保。不久解放大军已临县境，声威震慑，张不敢久留，惊慌逃离古蔺。这时学校已停课。王国良在逃跑的那一天中午，他带两个武装兵到我家里索要代课薪资大洋，这是他狗急跳墙的行为。在几年来学校薪资均是黄谷拨条，那来大洋，他与我相持数分钟没有所获，便惊慌而逃。

我第三次任校长时，和青年教师们相处时间都很长，尤其进步人士每期我均聘有数人，他们的革命行动，我是同情而支持的，没有阻碍并有护卫行动，在那几期中没有使他们遭受任何损失。

随着时代的演变学校逐渐兴起一些节日活动。有些是每年规定按时举行的，有的是临时性的。三月三日的“踏青”旅游，举行植树节活动，当时的政府通知学校机关举行，只是在指定的一个植树地区，一批首脑人物各执锄头照一张像片作纪念以就叫植树造林。四月四日的儿童节，由学校选健壮儿童参加评选获奖。五月间的纪念就多了，有“五四”、“五九”，“五卅”等纪念日，有时旧政府通知开会，不举行的时间较多。旧历九月九日重九登高，学校举行爬山运动，或远足旅程。十月十日旧政府国庆纪念日，放假一天，举行开会庆祝，夜间提灯游行，这些大会通知到场开会的都是学校为主体，也有单位人员参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均欢欣鼓舞地举行庆祝，一小也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